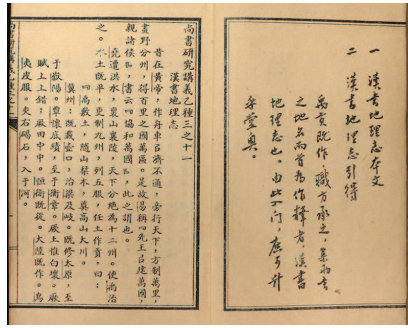


代表性藏书中所见

谭其骧先生的学术与交往

孟刚

今年2月25日是谭其骧先生诞辰110年，我们特约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馆员孟刚选取谭先生生前藏书二十余种，首次介绍，以作纪念。限于篇幅，重点刊发其近现代书目部分，古籍部分仅作简述。文章全部内容及其书影，请见“文汇学人”微信公众号及文汇App。



谭其骧先生(1911年2月25日—1992年8月28日)，字季龙，籍贯浙江嘉兴，出生于沈阳，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中国历史地理、中国史的研究和教学，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他历时三十余年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集中反映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成果，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他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具有学科开创意义。他在民族史、文化史、地方史、地理学史、上海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重大成果，提出不少独到见解。主要论文编入《长水集》(上、下册)、《长水集续编》和《长水集补编》，近年已收入《谭其骧全集》。

1992年谭其骧先生去世后，其子女谭德睿先生等四人遵照谭先生遗愿，将谭先生收藏的全部图书资料和相关文献捐赠给复旦大学。2006年，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成立“谭其骧文库”。经复旦大学图书馆及该所整理编目，“谭其骧文库”共收藏线装书660余种4880册，平装书3200余种，杂志近1000册，其他各类档案文献资料等664宗2000余件。

“谭其骧文库”所藏线装书，主要为明清刻本，民国以后的部分主要为铅印本，还有少量油印本。共计明刻本3种、清代版本381种、民国版本246种、1949年以后版本30余种。其中比较珍贵的是清代史学、地理学等著作的初印本，以及十几种清末民国出版的各省舆图，有的系叶德辉、徐乃昌、吴士鉴等人旧藏。平装书3200余种，主要是1911年以来的史学著作和历史地理类图书，其中不乏一些现代史学家的著作。还有二十余种谭先生批校本，比如《历代舆地图》《隋书地理志考证》《中国历史地图集》等。

为纪念谭其骧先生诞辰110年，我们对谭先生藏书进行了整理，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图书，拟编篡出版《“谭其骧文库”藏书目录》，先从其中选取二十余种刊发，以飨读者。大致按照学科特点和成书时间为序。

《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初编，北平图书馆编，民国二十二年(1933)北平图书馆刊印

1932年初到1935年初，谭先生任北平图书馆馆员，主要工作是汇编馆藏方志目录。截至1932年底，除去副本，该书共收入方志三千八百余种。他还新创了部分编纂凡例，用黑体字和普通字来分别郡邑，让读者较容易辨别方志所载的范围。署名馆长袁同礼的序实际也由其撰写。

《胡应麟年谱》，吴晗撰，《清华学报》第9卷第1期，1934年1月有吴晗题写“季龙兄指正”

吴晗原名吴春晗，著名历史学家。谭先生1931年在燕京大学时就认识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吴晗，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吴晗受聘云南大学教授。1940年谭先生去南迁的浙江大学任教时途经昆明，还专门去看望过吴晗。1955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在接到毛泽东主席交付的任务后，推荐谭先生赴京绘制历史地图，吴晗是编委会负责人，两人共事十一年。“文革”中，谭先生虽不得不上缴吴晗的全部信件，但还是保存了两种吴晗送他的抽印本，只是将其名字涂去。《胡应麟年谱》以考述谱主学术与经历为主，兼及其交游、藏书等，所列的事迹逐一标明出处，严谨可靠。

《古槐书屋词》一卷，俞平伯撰，民国间自印本，约出版于1936年。有俞平伯题写“季龙社长兄，丙子中秋平伯”。有“德清俞氏”、“平伯所作”印

谭其骧先生喜看京剧，也爱唱昆曲，曾与傅惜华、朱家潘、陆宗达等在国剧社学唱昆曲。1935年，由俞平伯发起在清华大学成立古音社，谭其骧也是社员。1950年代他在北京时也经常参加曲友活动，主要聚会地点即在俞宅。该书为俞平伯内弟许宝騄手写上版，写刻精美，为俞平伯著作中的罕见版本。

《尚书研究讲义乙种三之一：汉书记地理志》附《关于“尚书研究讲义”的讨论》，顾颉刚编，民国二十年(1931)石印本

1930年秋，谭先生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当研究生。1931年秋，选修导师

曲友活动，主要聚会地点即在俞宅。该书为俞平伯内弟许宝騄手写上版，写刻精美，为俞平伯著作中的罕见版本。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撰，商务印书馆1943年初版。有方豪签名，“方豪”印。内有一处谭先生批校

1988年9月8日，谭其骧在华东医院病房填写表格时写道：“受本师顾颉刚先生影响较深，此外，二三十年代的史学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都对我发生了影响。”谭先生还藏有陈寅恪先生民国出版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蒋天枢先生送给谭先生一册《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里面有数处陈先生的修改。方豪是谭先生浙江大学同事，一生从事中国史和中西交通史研究，撰有《中西交通史》等。

《历史时期世界气候的波动》，竺可桢撰，1961年9月单行本。有竺可桢先生题写“其骧先生惠存，著者赠”

1940年，谭其骧先生曾任教于内迁贵州的浙江大学，竺可桢先生时任校长。竺可桢作为地理学家和气候学家，非常重视发掘古代史料中的地理和气候资料。解放后，竺可桢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对谭其骧的意见和评价十分重视。1972年，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就得到谭其骧的赞扬。1973年6月10日，竺可桢致信谭其骧，谈及谭先生信中指出他文章的两处错误当删除，还邀请谭其骧担任《中国自然地理》历史地理组编委。《历史时期世界气候的波动》一文运用丰富的历史文献得出历史时期的中国乃至世界气候有波动这一结论，该文后载于1962年《气象学报》第31卷第4期。

《蛮书校注》，唐樊绰撰，向达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有向达题写“季龙兄先生教正，向达谨呈，一九六二年八月廿六日于海淀勺园之风烟里”

史念海是历史地理学家，解放后长期执教于陕西师范大学。对黄土高原区域历史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和历史军事地理研究成果丰硕。谭先生对此书十分重视，指定研究生必读。封面上的篇名摘录是谭先生写下的，以便查阅。

《承德市城市发展的特点和它的改造》，侯仁之撰，承德市城市建设局1975年印行

向达是敦煌学家、中外交通史学家，是谭先生在北平图书馆和浙大的同事，后任教于北京大学。谭先生还保存有向达先生赠送的《唐代俗讲考》抽印本。

书筐

有侯仁之题写“季龙同志，此文初稿在修改时，承您热情帮助，是我所难以忘怀的。仁之敬赠”

侯仁之是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和谭其骧、史念海三人被公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对历史地理学理论、北京城市历史地理、沙漠历史地理成就最大。

《真赝风土记校注》，元周达观原著，夏鼐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有夏鼐题写“季龙同志指正，夏鼐赠，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夏鼐是考古学家，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1971年，夏鼐负责《中国历史地图集》原始社会遗址图的编绘，亲自编绘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地名表，并据以上图。1979年末到1980年初，两人为谭先生撰写的《七洲洋考》和《宋端宗到过的“七洲洋”考》多次往还书信，进行讨论。

《河山集三集》，史念海撰，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有史念海题写“季龙先生指正，念海拜上”

从另一方面看，这里需要关注的实质问题是，在众多的文本中，为什么单单是现在看到的传世文本得以在后世流传？最初，不同的版本本来具有大致同等的流传机会，为什么其文本逐渐消失或被淘汰，而唯有现在看到的传世文本被保留并流传下来？这里当然有很多的复杂因素，也不能排除某些偶然的理由，但其中体现的义理与表述方面的优胜之异，显然是不可忽视的方面。这种情形类似思想史中经典的生成和传承。历史上曾出现过众多的著述或表达不同思想的文本，但后来成为经典、在历史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仅仅只是其中有限的一部分，为什么历史上出现的众多文献

从另一方面看，这里需要关注的实质问题是，在众多的文本中，为什么单单是现在看到的传世文本得以在后世流传？最初，不同的版本本来具有大致同等的流传机会，为什么其文本逐渐消失或被淘汰，而唯有现在看到的传世文本被保留并流传下来？这里当然有很多的复杂因素，也不能排除某些偶然的理由，但其中体现的义理与表述方面的优胜之异，显然是不可忽视的方面。这种情形类似思想史中经典的生成和传承。历史上曾出现过众多的著述或表达不同思想的文本，但后来成为经典、在历史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仅仅只是其中有限的一部分，为什么历史上出现的众多文献



传世文本与出土文献：走向合理定位

晚近以来，随着地下考古的进展，新的文献时有发现。以《老子》一书而言，与之相关的出土文献便包括20世纪70年代(1973年)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包括甲本与乙本)，以及稍后20世纪90年代(1993年)的湖北郭店楚墓竹简中的《老子》残简。其中，帛书《老子》虽然也有残缺的内容，但相对更完整一些，比较而言，郭店楚简的《老子》则缺失较多。尽管存在诸种差异，但以上出土文献都涉及《老子》一书的不同版本，各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作为出土文献，这些陆续发现的典籍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内容看，出土文献中若干文字的运用以及内容的表述等等，与传世的文本常常互有区分，按照王国维所说的两重证据法(传世文献和地下考古材料的互证)，对传世的文本与出土的文献加以比勘，既为阅读和理解传世的文本提供了重要的比较参照，也有助于理解历史上文本的变迁以及不同文本之间的彼此相异。

然而，尽管在文本的层面，传世文本和地下出土文本之间往往存在差异，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也有不可忽视的内在学术价值，但对出土文献的意义不宜过于夸大。古代文献的流传，以传抄或传刻为主，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会形成不同的文本。这里可以仍以《老子》为例。早在战国时期，《老子》一书可能已经出现了不同的传抄文本；事实上，帛书《老子》和郭店《老子》残简，与现在的传世文本便在文字、表述、句式上有种种不同。然而，在解读时，不宜简单地以是否属出土文献为取舍的标准。就《老子》第十六章来说，其中有“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的表述，然而，该句在郭店楚简残本中却作“天道员员，各复其董(根)”。从语义和逻辑上说，“天道”普遍而为一，本身即为万物存在的根据，作为统一的本源，天道显然无法以“各”复其根本来规定，唯有芸芸之物，才有“各复其根”的问题。以此观之，传世文本的表述(“夫物芸芸，各复其根”)于义于理显然更为可取。一些作者对“天道员员，各复其董(根)”作了种种疏解，虽繁复引证，但仍不免有曲为之说的趋向，而未能注意以上提及的实质含义。这一现象同时也表明：把握经典，不能拘泥于出土文献，更不宜有“凡出土文献皆胜于传世文献”的观念，而须如王国维所言，运用二重证据法，作合理的比较研究。事实上，并不是晚近出土的文本才是最好的，或者说，新出土的文本，一定优于传世文本。就时间而言，即使出土的文本比传世文本更早一些，也显然无法被视为最原始的文本：作为出现于一定的历史时期的文本，它本身并不一定具有开端的性质，从历史的层面推测，在它之前可能存在更原初的文本。从内容上说，其表述、义理也不一定就是各种可能文本中最为上乘的。鉴于以上事实，无条件地将出土文献视为最为完善的文本，显然既是非历史的，也缺乏充分的理性依据。

从另一角度看，这里需要关注的实质问题是，在众多的文本中，为什么单单是现在看到的传世文本得以在后世流传？最初，不同的版本本来具有大致同等的流传机会，为什么其文本逐渐消失或被淘汰，而唯有现在看到的传世文本被保留并流传下来？这里当然有很多的复杂因素，也不能排除某些偶然的理由，但其中体现的义理与表述方面的优胜之异，显然是不可忽视的方面。这种情形类似思想史中经典的生成和传承。历史上曾出现过众多的著述或表达不同思想的文本，但后来成为经典、在历史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仅仅只是其中有限的一部分，为什么历史上出现的众多文献

要而言之，一方面应充分注重出土文献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到思想的实际演化过程，避免不适当地赋予出土文献以它并不具有的意义。对传统思想的诠释，既应尊重传世文本与出土文本、不同的传世文本之间的比较，又需要对传世文本的意义予以合乎历史的肯定。(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近代疾疫与循证医学

1919年3月，北洋政府成立中央防疫处，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卫生防疫研究专门机构。1925，兰安生在北京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公共卫生事务所——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该卫生事务所承担的主要工作包括：环境卫生，即打扫垃圾、卫生稽查、检验牲畜；预防接种，即布种牛痘、霍乱预防注射；诊疗疾病，即诊疗新病、病人临诊；学校卫生，即检查学生体格、发现缺齿、矫正缺齿；妇孺卫生，即产妇产前检查、婴儿诊疗；公共卫生，即开展卫生展览会、分发宣传品、卫生演讲。1933年，肺结核肆虐华夏，王良从法国引入卡介苗，他在重庆建立起了中国第一个卡介苗实验室，开启了中国研究培育疫苗的先河。

伍连德以研究东三省鼠疫为契机，亲手实施了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例病理解剖，并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肺鼠疫”的概念。其实验的过程、统计学的方法、流行病学的群体概念、诊疗的对照分析，无一不体现循证医学的实际应用。之后，伍连德、王吉民、陈邦贤、范行准、李涛、余云岫、陈方之、李庆坪等人陆续对中国传染病史做了大量研究。几乎每一种传染病病史，都有专门的论著，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们的专病史研究论述体现了循证医学的演进过程。(作者单位分别为上海市胸科医院、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